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第25-28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成果和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

简新华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即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 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信阳师范学院，邮政编码：430072。

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经济学界在学习、领会这个重要论述时,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取得了哪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应该并且必然有重大创新和发展。但是,国内外都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似乎主要是引进、学习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些学者则提出,少有中国经济学家创立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有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总结出新理论、新概念、新思想。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说不通的、站不住脚的,实际情况与之相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一样,也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取得了不可否认的重大成果。最集中的体现是,基本形成了主要由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原创性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新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动能、新经济的新观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五大建设“五位一体”的新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创业的新战略等等,这些更是最新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以上这些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具体内容的简短概括和归纳。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在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经济发展理论方面做出了这么多创新和发展的国家。这正是中国在经济方面能够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中国提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等崭新的经济学理论,并且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什么有学者会忽略呢?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成绩,只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结果,与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无关;而之所以还存在问题和缺陷,则是由于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还不够、不彻底呢?这是有原因的。

除了中国经济学文献绝大部分以中文发表、绝大多数外国人看不懂、流传到国外的也不多、真正看过和能够看懂的外国人极少,等等,这些语言方面的限制以外,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主观上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以什么标准判断?谁来判断?不同的方法、标准、学者,判断的结果可能完全相反。如果以是否能够使用通用的国际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是否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为标准,换句话说,以是否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否在西方国家主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及发表多少文章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贡献和影响,中国经济学家肯定普遍难以获得较高的评价。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体制僵化,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经济理论,更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过时,只有采用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等方法的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才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才是所谓现代经济学。以此为评判标准,自然也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以上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倾向,在思考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过去和未来的创新和发展时特

别需要首先予以澄清和纠正。实际上,科学准确地判断经济学家学术水平的高低、贡献和影响,只能是看其研究成果有没有理论和方法创新、是否解决或者有助于解决人类社会和各个国家面临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是采用什么研究范式、运用什么研究方法、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后一种判断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但是不准确、不科学。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现在特别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究竟应该怎样创新和发展呢?这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艰巨任务。但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目前经济学界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澄清。有学者提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能有两种路径: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有用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其二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有学者还认为“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满怀期待地相信中国经济学家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贡献于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时代。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采用这两种路径能否实现上述良好愿望,需要进一步深思。

笔者完全赞同第一种路径,因为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目的和主要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正确路径或者方法,舍此别无他途。而第二种路径内涵则不是十分清晰明确,容易产生歧义。如果这里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基础,这里的“现代经济学”只是或者主要是指中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第二种路径就与第一种路径没有实质性区别。但是,如果只是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且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如果这里模糊的“现代经济学”,^①主要不是指(乃至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只是或者主要指现代西方经济学,这种路径换一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吸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或者主要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的路径。显然,这种路径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到目的及任务,都是与第一种路径根本不同的途径,这绝不能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路径,因为这是主要采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不可能达到上述未来中国经济学理

^① 所谓“现代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流行起来的说法。但是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完全相反。准确地说,现代经济学应该是指现代存在的所有经济学的总称。按照科学性和阶级性的不同,现代理论经济学至少应该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又有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实际上,当前一些学者理解的“现代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代名词,就是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只是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亦不包括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比如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而且在中国是有害的。

论创新和发展的目的及主要任务。

这“两条路径”是两种目的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种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另一种是要“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而这里的“现代经济学”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理论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学。因此，这两种途径不能简单说成是“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是基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路径，不可能殊途同归，也不可能像有的学者期待的那样，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两种路径”也是两种研究范式根本不同的道路。一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另一种则是采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这两种研究范式存在本质差别。所谓“经济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经济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总称。在阶级社会中，立场主要就是阶级立场。研究范式还包含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不仅仅是具体研究工具和方法（包括话语表达方式）。而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也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则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是两种阶级本质属性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即使是从技术或工具角度而言属于中性的具体分析研究方法，比如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定量研究中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总量分析与个量分析、存量分析与增量分析、空间上的宏观分析与中观和微观分析及其区域研究、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现状分析与历史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研究、现象与本质分析、形式与内容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分析、可能性与现实性分析、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对策研究、比较研究、经济预测方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对策论）、大数据、云计算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采用的经济研究方法，以不同的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指导，持有不同立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的经济学家，运用这些具体方法或工具的方式、成效也会有差别。西方经济学就存在重现象和定量分析，而轻本质和定性分析的倾向。

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的路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部分中国经济学者所走的路，难以避免有的学者批评的那种现象出现，即主要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来自西方的现有理论，或对现有理论只作简单的延伸，这样的研究不仅难于出现引领世界经济思潮的大师，而且很难发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运用更为现代的深奥的数学和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研究，这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欠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确需要学习、参考、借鉴，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是经济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则是更重要的基本方法。即使采用现代的最先进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如果基本的思想方法不对，没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和运用，同样得不出正确科学的研究结论。比如，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西方经济学者也会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应对之策，但是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不可能甚至不敢深究到私有制这个本原，只可能停留在现象上，进行浅层次分析，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只能短期暂时缓和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尽管两百年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本消除的痼疾。

本文已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第56-66页。

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兼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简新华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经济发展成就巨大，而且经济学理论也有重大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实践来源，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实践，也包括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指导，也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是经济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更重要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可能有机结合；经济学如果在中国按照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两种不同路径发展，必然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不可能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林毅夫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其理论研究的突出特点是长期立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既注重学习、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又不迷信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充实和完善了中国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又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特别是采用比较优势和结构演进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使其研究更具特色，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林毅夫教授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文章，分析预测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景，评估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实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有机结合和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种路径等观点。笔者读后很受启发，特别是文章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这个对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的确有道理，读来令人鼓舞。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状况和未来发展与创新的来源、路径方法的一些看法，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不是十分准确的地方，有些主张也可能需要再推敲，特提出以下商榷意见，就教于林毅夫教授和学界同仁，以期科学地认识并促进中国经济学理论更好地创新和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经济发展成就巨大，而且经济学理论也有重大创新和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学说史表明：成功的经济发展实践必然会产生更符合实际的新的经济理论，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是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思考》一文也提出，“现象越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036）

作者简介：简新华（1947-），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就大多集中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随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大师出现的集中地也跟着转移到美国”。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必然应该有重大创新和发展。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国内外不少学者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好像只是引进、学习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自身似乎毫无建树、了无进展。林毅夫教授虽然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是在“思考”一文中他却写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有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总结出新理论、新概念、新思想”，并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做出贡献，能够在国际经济学界引领新概念、新思潮的，基本上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基本上还没有出现”，中国基本上在经济学理论上还没有做出贡献。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说不通的、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一样，也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取得了不可否认的重大发展。对此，笔者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讨论。这里，只作简单的归纳和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集中的体现是，基本形成了主要由八个方面内容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具体内容和逻辑联系是：一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理论；二是说明了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什么阶段？即中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成熟完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是研究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四是研究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兼顾效率和公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五是在弄清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特征和方式，即市场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包括公有制相结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六是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研究和说明，即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五大新的发展理念，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自主创新道路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依靠改革形成和发展的，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说明改革，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全球化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参与、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最后结合新时代的新情况重申说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实现共产主义。这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最重大最突出的创新和发展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是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能够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还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公有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理论，既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又没有完全否定而且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经典理论，应该说，这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从林毅夫教授最关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理论来看,其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不仅弥补了改革开放以前缺乏完整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而且提出许多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观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五大新的发展理念,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自主创新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动能、新经济”等之外,还有比较系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理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理论(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以及“工业化中的先农业和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后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的“两个趋向”理论”、“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理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适度同步’理论”、“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并举的理论”、“工业化过程中农民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的‘两个非农化协调’理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先非农化后市民化的‘两次转移’理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理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以上这些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具体内容的概括和归纳,是不全面的,也可能不一定都非常准确,但是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1978年开始,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像中国这样在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经济发展理论方面做出这么多创新和国家吗?应该说是独一无二!这正是中国在经济方面之所以能够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

为什么明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创新和发展,却偏偏要完全否定、不肯承认呢?为什么明明中国提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等崭新的经济学理论并且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发展,却偏偏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为什么偏要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成绩就只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结果、与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无关,而之所以还存在问题和缺陷则是由于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还不够、不彻底造成的呢?表面上看,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好像不可思议、不好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除了中国经济学文献几乎都是以中文发表、绝大多数外国人看不懂、流传到国外的也不多、能够看和真正看过的外国人极少等这种语言文字方面的原因以外,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主观上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以什么标准判断?谁来判断?不同的方法、标准、学者,判断的结果可能完全相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体制僵化,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经济理论,更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错误的经济学,或者说是早已过时的经济学,只有采用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的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才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换言之,在它们视野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或者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为评判标准,自然它们也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而且,如果以是否“能够使用通用的国际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为标准,换句话说,以是否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在西方国家主要经济学期刊上是否发表和发表多少文章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贡献和影响,中国经济学家肯定学术水平很差、没有什么贡献和影响。曾经有学者就以此为标准断言中国大陆没有一流经济学家,至多只有为数很少的二、三流经济学家,甚至香港有学者做出“精确”判断,“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但是,这种判断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否定,采用同样研究范式、运用同样研究方法、在同样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很多是一般水平的、没有什么创新和学术价值的、甚至是存在错误的、有害的“垃圾”文章。所以说,科学准确地判断经济学家学术水平的高低、贡献和影响的有无

大小,只能是看其研究成果有没有理论和方法创新?是否解决或者有助于解决人类社会和各个国家面临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是采用什么研究范式、运用什么研究方法、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这种判断衡量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但是不准确、不科学。

有资料介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巴顿·弗雷雪(Belton Fleisher)教授曾经说,投稿到《中国经济评论》的学者,有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和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但是,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能够将中国经济问题讲得很清楚、很透彻,而大多数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还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这种情况属实,这同样也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学水平很低。什么叫把中国经济问题讲清楚、透彻?难道中国学者大多数不比外国学者更熟悉了解中国经济情况吗?如前所述,关键在于以什么标准判断?谁来判断?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学者,判断的结果可能完全相反。而且,向《中国经济评论》投稿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其实大部分都是到国外留学过的学者,不然很难用英文写作,即使是国内培养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他们为了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往往都是照抄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迎合、退让、迁就,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自然没有国外西方经济学家驾轻就熟做得好,必然会出现像林毅夫教授所批评的那样“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的研究方式,或对现有理论做简单的延伸”,“这样的研究不仅难于出现引领世界经济思潮的大师,而且,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发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倾向,在思考中国经济学理论过去和未来的创新和发展时特别需要首先予以澄清和纠正。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相应的西方经济学占主体地位并且掌握话语权的当今世界,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要想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认可、肯定,不说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决不能因为一定时期内得不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认可、肯定,就闭眼不看现实,就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没有做出什么贡献。我坚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必将逐步扩大、话语权必将不断增强、世界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肯定甚至接受中国经济学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究竟应该以什么经济学为基础和指导?或者说来源是什么?到底应该主要采用什么研究方法?这是必须明确的关键问题。林毅夫教授说“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从这段论述可见,林教授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来源,包括实践来源、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等三个方面,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可能存在不全面、不清晰、不准确的偏差。

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来源,的确应该从经济实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才更为完整,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创新不是空中楼阁、凭空而来、从零开始,除了实践基础之外,必然还要以一定的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和指导,还需要采用科学的基本思想方法、研究工具和具体方法,但是必须全面、清楚、准确地把握这三个来源的内涵和外延。而要全面、清楚、准确地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新理论的三个来源的内涵和外延,笔者觉得首先又必须明确,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为什么要创新和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主要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

的。由于未来 30 年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以,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为什么要创新和发展,决不是纯粹为了经济学自身的创新发展而创新发展,更不是为了融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主流,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创立新的经济学理论、为未来中国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稳定高效发展、逐步走向发达繁荣和共同富裕服务。这种根本目的也就决定了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and 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服务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是我们现在思考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学构建、创新和发展必须明确的,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中国现代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种种说法和主张都是模糊、抽象、不准确的,现在之所以围绕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创新和发展争论这么多、分歧这么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学构建、创新 and 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目的和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决定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实践、理论、研究方法来源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践来源

从实践来源来看,毫无疑问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实践来源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实践及其经验教训,但是还应该包括世界经济和其它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甚至还要参加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是离不开世界经济实践的,而且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既各具特点又有共性,必有可取之处,他们的宝贵经验教训也值得中国吸收借鉴,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实践来源还应该包括世界经济和其它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实践出发来研究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也不能例外。

2. 理论来源

从理论来源或者说理论基础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and 发展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包括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思考》一文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看成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理论来源,既是不准确的,更是没有真正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理论来源。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容。^[1]而且,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合理有用部分也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理论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应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部分来源。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虽然必须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也必须继续引进、学习、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并且将继续研究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发现或者揭示其演进规律,提出有一定成效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方法,这是值得中国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参考借鉴的。虽然由于西方国家的国情与中国的国情差别很大,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本质区别,西方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更是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不能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但是也不能全盘否定、完全排斥。

以什么经济学作为指导,是与理论来源有关的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and 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继

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往和未来遇到的许多问题,是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没有碰到过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研究和解决;也不单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重大创新和发展,并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产物,相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学习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要发展的是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本不同,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都是西方经济学指导不了的。若要用以指导,只会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引入歧途。

3. 研究方法来源

从研究方法的来源来看,林毅夫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之一,这个看法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究和明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对什么是“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从《思考》一文的简短论述中可见,所谓“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应该是指现代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语言表述的方法,简单地说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不少学者往往统而言之、未做明确界定。“思考”一文也未做界定,可能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所共知、不言自明的普通常识,其实不然。所谓“现代经济学”,的确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泛流行的说法,但是对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提出“我们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2]按照这种理解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而且是唯一的,也就不存在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实际上,根据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即存在于古代或者以往时代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即存在于现代的经济学),但是处于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又可以依据科学性、阶级性、国别地区性、具体研究对象等的不同划分为多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3]仅就“现代经济学”而言,既有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既有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等,因此,不加区别地抽象笼统地讲“现代经济学”是不清楚、准确、严谨的,容易造成认识模糊、思想混乱。

事实上,现在多数学者理解的“现代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代名词,就是指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只是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不包括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比如,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理解是不准确的、而且在中国是有害的。

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方法来源的林教授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不知是否就只是指现代西方经济学或者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否也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假若是,那就是说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来源的只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

研究方法,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来源的,至少还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这种看法还使得《思考》一文自相矛盾,因为该文一方面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又实际上认为只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研究方法来源,这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不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研究方法来源。

如果不是,也就是说林教授所理解的“现代经济学”中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来源也就应该包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即使如此,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来源,虽然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需要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合理有用的研究方法,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从《思考》全文来看,与“现代经济学”相关的名词还有“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等多种说法,其既没有说明这些名词概念之间内涵外延及其区别和联系,更没有提到还有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此可见,林教授的这几种关于现代经济学的说法是通用的,就是指的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因此,《思考》认为,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研究方法来源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上所述,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至于什么是经济研究范式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究竟应该采用什么范式?本文将在下面再专门讨论。

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能够有机结合吗?

《思考》篇幅最长的是第四部分,论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如何有机结合”,我感到这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最多的部分,既没有说清两者为什么要结合?为什么能够结合?什么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怎样有机结合?等等,而且在关于两者结合的论述中又存在歧义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解。

1.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可能有机结合

如果说现代经济学中包含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思考》一文所主张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有机结合”中,就既包含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有机结合,也包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之一,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显然就像是说“自己与自己有机结合”那样的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

那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能否实现有机结合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所谓经济学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经济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总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范式的基本内容。在阶级社会中,立场主要就是阶级立场。研究范式包含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不仅仅只是具体研究工具和方法(包括话语表达方式),而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也是具有阶级属性的。比如,“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既是一种理论观点,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起点,就是私有制的反映,是有着浓厚的阶级烙印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范式内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世

界观和方法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基本思想方法,而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则主要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为基本思想方法(从经济人假设、主观价值论、经济危机心理因素论、重现象和定量分析轻本质和定性分析等等都可以看出),这是两种阶级本质属性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说研究范式),是不可调和的,两者不可能结合,更不可能有机结合。

这里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不可能有机结合,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with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丝毫也不能相互参考借鉴。实际上,从技术和工具手段角度而言的具体分析研究方法,比如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定量研究中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总量分析与个量分析、存量分析与增量分析、空间上的宏观分析与中观和微观分析及其区域研究、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现状分析与历史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研究、现象与本质分析、形式与内容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分析、可能性与现实性分析、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对策研究、比较研究、经济预测方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对策论)、大数据、云计算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采用的经济研究方法,区别只是存在运用的程度、水平、正确合理性的不同。以不同的基本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持有不同立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的经济学家,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工具的方式、成效也会有差别。西方经济学就存在重现象和定量分析、轻本质和定性分析的倾向。

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运用更为现代的深奥的数学和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研究,这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欠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确需要学习、参考、借鉴。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是经济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更重要的基本方法。因为,即使采用最先进的现代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如果基本的思想方法不对,没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和运用,同样得不出正确科学的研究结论。比如,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经济学也会分析研究发生的原因及其应对之策,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决定他们不愿意、不可能甚至不敢深究到私有制这个本原,只可能停留在现象上,进行浅层次分析,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只能短期暂时缓和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尽管两百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本消除的痼疾。恩格斯 1883 年 3 月 17 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发现”^[4]是马克思人生的两个伟大的发现。这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做到的。

2.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思考》的第四部分,实际上是在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即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合理对待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一直流行一种的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革命的理论 and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理论、缺乏市场经济理论和合理发展私有制经济的理论,中国要实行的是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私有制经济、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适应这种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要求,已经过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

础,只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应该用凯恩斯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用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习近平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5]实践也证明,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判断。

第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不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且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是创立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二,西方国家的实践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特别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等的发生,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过时。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还是“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都只能应付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中寻找答案,进行制度变革。

第三,中国的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础。虽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也不可能提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学习、吸收、参考、借鉴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借鉴”不等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主要是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6]

3. 马克思提出了完整科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依然符合现代经济的实际

《思考》贸然地断言“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种因素决定的”,我认为这种论断是不太准确的,而且低估了马克思相关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众所周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整科学的,其基本内容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到现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著和相关教科书都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重复。这里需要强调的只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重要基本原理反映的是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不仅适用于马克思的时代,而且适用于现代经济。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与《思考》的上述断言有关的内容。

首先,《思考》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这种说法把生产力当成了经济基础,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的经典论述中明确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 不可思议的是,《思考》竟然明确写道“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值得指出的是,不知这里林教授是不是把“经济基础”这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和外延看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即使是如此,这里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就不仅只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关关系,还应该包括生产、交换(或者流通)、分配、消费等在内的社会活动(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即运行和发展的内容和方式,主要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产

出的分配方式)、构成上述社会活动总体的各类产业部门及其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以及与上述这些内容有关的制度安排即经济制度等。

其次,马克思不是没有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何种因素决定”,马克思在上述经典论述中实际上同时也说明了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有反作用,因此也是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至于“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的问题,毫无疑问,是由多种因素决定和影响的,不仅仅只是林毅夫教授所说的“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这个问题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巨著都不能完全说清楚的,这里只能做简要概括说明。生产力的决定和影响因素包括:构成生产力本身的各种要素(劳动力、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等)以及决定和影响这些要素形成和变化的因素、生产力或者说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市场与计划、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等)、产业的类型和结构、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及其相关制度等)的反作用、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其相关制度等)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等。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社会生产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由什么因素决定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所以,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决不是没有讨论研究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提出了许多基本原理,发现了许多普遍规律。比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节约时间规律、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规律、社会生产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等等,同样适用于现代经济。在这些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中,包括林毅夫教授特别重视的根据资源禀赋的状况及其变化和比较优势的不同来选择产业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理论。当然,这些基本原理、普遍规律在现代经济中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并且在现代经济中还会发现新规律、提出新原理。的确,马克思本人不可能直接研究现代经济,但是不能说马克思完全没有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的基本原理、发现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现代经济。

最后,《思考》中“国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的决定因素”的论述,更是令人费解,使人难以看出国家、经济基础、生产力、产业和技术究竟是什么逻辑关系?这里存在多层歧义:第一,“国家作为经济基础”是说国家是经济基础吗?如果是,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的国家肯定不是指地域、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是指政府机关、政治机构意义上的国家,而政府机关、政治机构意义上的国家是上层建筑;第二,“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是什么意思?是说产业和技术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或者主要标志吗?如果是,能说产业和技术进而生产力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首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虽然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基础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但是也不能反过来说生产力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啊!第三,“国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的决定因素”是说国家是产业和技术进而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吗?如果是,那就是说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决定生产力,是否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呢?!即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进而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同样也不能反过来说国家决定生产力、决定产业和技术啊!我们应该看到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度夸大,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可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四、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两种路径吗?

《思考》在最后的结语中提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能会有两种路径: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和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有用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其二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思考》还认为“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满怀期待地写道,“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贡献于中国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时代的到来。”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真有这两种路径吗?采用这两种方式真能实现林毅夫教授的良好愿望吗?需要反思。

笔者完全赞同第一种路径,因为这是达到本文前述的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目的和主要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正确路径或者方法,舍此别无他途。至于林教授提出的第二种路径则内涵不是十分清晰明确,存在很大的歧义。如果这里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基础,这里的“现代经济学”只是或者主要是指中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第二种路径就与第一种路径没有实质性区别。从《思考》的论述来看,林教授所说的第二种路径肯定不是这种含义,而只是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要“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如果说这里的模糊的“现代经济学”,主要不是指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根本就不包含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只是或者主要是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这种路径换一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吸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或者主要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的路径。显然,这种路径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到目的任务都是与第一种路径根本不同的途径,这决不能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路径。因为,这是主要采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不可能达到上述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目的和主要任务。所以,这“两条路径”是两种目的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种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另一种是要“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而这里的“现代经济学”并没有明确说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这两条途径决不是“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是基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路径,根本不可能殊途同归,也不可能像林教授期待的那样,“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2]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1-12.
- [3] 简新华.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J].北京:经济研究,2016(3):21-25.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94-597.
- [5]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OL].人民日报,2016-5-19(2)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5/19/nw.D110000renmrb_20160519_1-02.htm.
- [6] 简新华,余江.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J].北京: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6):4-11.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Economics Theory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Lin Yifu

Jian Xinhu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not only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made maj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conomics theory. The source of practice in China's economics theory innovation is mainly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ics must continue to follow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a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s well as learn from the scientific components of Western economics.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re important methods of economic research, b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re more important basic methods. It is impossible for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search paradigms of modern economics to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f economics develops in two different paths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i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result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two to both become the organic components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